

香港邊緣社群社會資本的貧乏

黃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hwong@cuhk.edu.hk

撮要：本文根據調查資料，分析香港邊緣社群（包括貧窮人士以及無業、不固定工作者）的社會網絡，並根據這些人士的社會網絡的規模及同質化程度，來衡量其社會資本的數量及性質。結果顯示貧窮人士社會網絡的規模明顯較非貧窮人士小，尤其以介紹工作網絡的差別最明顯，這顯示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較非貧窮人士少。貧窮戶的社會網絡中亦以無業人士居多，以致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的情況。沒有工作及屬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的規模亦明顯小於有固定工作的人士，其社會網絡亦出現同質化，而無業或工作不穩定對男性造成同質化的影響較女性大。所以，無業及不穩定工作人士的社會資本較固定工作人士少。要真正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必須增加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analysed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marginal groups including the poor, the un-employed and people with unstable jobs in Hong Ko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ocial capital of the above groups were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size and homogeneity of their social network.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ize of social network of the poor was significantly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non-poor, especially in the network of job searching. This suggests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poor was less than that of the non-poor. It is more likely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of the poor was constituted of the un-employed, that was why it was more homogenous. Social network of the un-employed and people with unstable jobs wa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people with stable jobs. The un-employed or unstable job holders also induced homogeneity in their social network, the impact of which was greater on male than female.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Hong Kong, we should increase the social capital of the deprived people.

Keywords: Poverty; Unemployed;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香港的貧窮狀況

香港的貧窮及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¹。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的經濟持續下滑，在2002年5至7月間，香港的失業率高達7.8%，有27萬5000人失業。香港的實質平均薪金指數由1999年第一季的100點下降至2002年第三季的98.6點，這顯示香港僱員的收入實質下降。2001年人口統計普查顯示，香港堅尼系數由1981年的0.451點持續上升至2001年的0.525點，創下歷年來的最高紀錄，亦表明香港的收入分佈趨向不平均 (政府統計處, 2001)。

香港過去對貧窮的研究多集中於靜態的貧窮線的制訂 (MacPherson and Lo, 1997; 莫泰基及梁成安, 1997; 黃洪及蔡海偉, 1996)，而較少動態地討論貧窮的成因與影響。本文便是希望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探討社會資本的減弱與貧窮的相互關係。

社會資本

近年不少學者均採用了“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去分析各地的貧窮狀況，並以社會資本為工具檢視消除貧窮的政策是否有效 (Bebbington, 1999; Friedman, 2001; Mitlin, 2001; Saegert, Thompson, & Warren, 2001)，但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定義並未能達成共識 (李惠斌及楊雪冬, 2000; 林南, 2001)，另有學者指出“社會資本”亦產生負面的作用與影響 (Portes, 1998; Portes & Landolt, 1996, 2000)。雖然如此，社會資本的概念對於社會政策，尤其是與消除貧窮及經濟發展有關的政策，仍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Fukuyama, 2002)。

從個人或微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是指個人透過與他人的社會聯繫 (social tie) 而獲得的經濟資源、資訊或機會。從社會、團體組織或宏觀的角度出發，社會資本指一個社會或組織透過組織之間或社會中的規範、網絡與信任來促進集體行動去實現共同利益 (Putnam, 1993)。Putnam (2000) 認為，一個人的社會資本可以從他 / 她所擁有的社群網路來描述和量度。故此社會資本是指借助於所佔據的社會關係網絡而把握的資源、財富、資訊或機會。一個人的社會資本愈多，能動員的資源就愈多，在生活和工作上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更強。社會資本源自人際關係，這是集體性的，亦會因為人際關係的破壞而消失 (Coleman, 1988)。

Wilson (1987) 詳細分析失業問題嚴重如何令芝加哥市中的舊城區愈來愈破落，而成為貧民窟。他指出，黑人貧民社區中的中產階級往郊區外移，令貧窮社區中缺乏傳播價值、模範及資訊的組織。失業人士及其家庭缺少收入，多依靠社會福利為生，所以並沒有多餘的開支去參與社會活動，再加上少數族裔及弱勢社群所面對的社會歧視及排斥，令失業人士較難與其他社群接觸及聯絡，造成其處

¹本文的數據源自我與城市大學社會科學部李劍明先生所進行的“香港貧窮線研究：跨學科的分析”，有關研究獲香港研究資助局的“角逐撥款資助”(編號: CityU 1184/99H) 資助，才能順利進行，謹此致謝。我亦特別多謝石丹理教授與王卓祺教授對本文初稿的指正，也感謝三名匿名評審員所給予的意見，但本文的錯誤乃筆者的責任。

於封閉及同質的網絡中。所以失業問題惡化與社會資本的弱化可理解為互為因果，變成惡性循環 (Rankin & Quane, 2000)。

社會資本很多時候不是靠強聯繫 (strong tie) 的動員，而是倚賴和較陌生的人建立聯繫及結連不同的弱聯繫 (weak tie) 的力量。通常，人不只與單一社會網絡有關，而會同時與多個社會網絡有聯繫。參與社會的層面越廣，那人就會有較多的弱聯繫網絡，而且這些網絡性質重複的機會就越小。網絡群越不重複，可獲取的資訊和資源也越多樣化，故那人便能擁有更高的解決問題能力。

Granovetter (1981) 指出，由僱員介紹工作會更可靠而且不會重覆網絡的弱聯繫 (weak ties)，這也比同質的強聯繫來得更重要。失業人士的社會資本的弱化，令他們與在職人士的社會聯繫減少，因而亦令他們難以進入勞動力市場。

Paugam (1999) 根據法國的經驗指出，貧窮人士被迫生活於孤立之中。窮人為了嘗試掩蓋本身的不幸，對於那些可能接近他們的人保持距離。他們令人羞恥的生活狀況令他們認為自己不屬於任何階級。Paugam 指出，法國的失業人士很多時候對於直屬家人之外的親屬都會保持疏遠的關係。而職業生涯愈不穩定，家庭關係愈可能不存在。男性比女性對這孤立的現象更敏感以及更易於內化。因此現時高失業率的社區中廣泛出現社會網絡解體的現象。

Saegert, Thompson 及 Warren (2001) 指出，可以透過三方面利用社會資本來協助貧窮社區脫貧。首先，可以在社區內部加強連結式社會資本 (bonding social capital)。在貧窮社區中加強人們之間的社會連結及有效組織可以提供基礎，令貧人有能力去面對貧窮問題、重建社區，以至有方法去控制自己的生命。其次，可以在社區之間加強橋樑式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貧窮社區也可以有強大的連結式社會資本，居民間因有機構的連結而有共同的需要和期望。若這些貧窮社區缺乏更廣闊的連繫，他們將繼續面對勢孤力弱的問題；不同社區橋樑式的結連，則可以為貧窮社區帶來更大的資源與機會。長遠來說，這能在不同社區之間建立信任與合作，為全社會提供消除貧窮的共識。最後，貧窮社區的社會資本須與主流的經濟及政治機構結連，而產生協力 (synergy) 效應，說明了若政府能與社區網絡合作，而非壓迫或漠視貧窮地區的存在，而公私營之間的合作使官民間有統一的社會網絡。

香港社會資本的變化

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百業興盛，尤其是製造業、服務業和非正規經濟均有長足的發展。在製造業和服務業中的工人透過建立行業性的人際網絡，創造自身的社會資本，從而獲取資訊和資源，增加額外的經濟利益。這些行業性網絡通常於工作間或工作的地區建立。

而在非正規經濟 (informal economy) 部門中，市場集結地 (marketplace) 成為地域性生活網絡建立的場所。非正規經濟部門的網絡協助成員有效及靈活地集合資訊和資源去創造經營和生存空間。這些低下層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以鄰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組成的地域性生活網絡，為勞工提供社會資本 (如介紹工作、交換勞動市場的訊息)，以避免他們下滑至勞動市場的底層。社區作為聚集的空間，成為創造社會資本的基本條件。

黃洪及李劍明 (2001) 對邊緣勞工的質性研究指出，自80年代中期，香港出現經濟轉型和去工業化，導致行業性網絡弱化。不少行業的經濟活動不斷退縮。在沒有經濟活動的支持下，原本行業網絡所發揮的節省交易成本作用也變得沒有必要。當然行業網絡不會單單因為失去經濟功能而消失，它還會發揮感情支援和社交作用。但失去經濟活動意味著工作環境不復存在，不再能提供原有的聚集功能，使網絡逐漸瓦解或因資訊及資源萎縮而失去其支援能力。當整個行業受到打擊時，原本可以發揮互相支援作用的同質網絡亦弱化。在行業不景時，成員信息、資訊和資源一同縮減，大大弱化透過網絡集體解決個別成員問題的能力，亦將造成社會資本的消失。

政府新市鎮的城市規劃政策及市區重建政策，令舊區土地成爲賺錢的商品。舊區空間的變遷既改變了原來舊區的經濟活動，亦瓦解了勞工過去在原區建立多年的生活及工作網絡，令他們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少。大型連鎖店及超級市場的興起亦威脅非正規經濟體的生存。貧窮人士社會資本累積所依托的舊市區空間以及非正規經濟體的活動受到嚴重的擠壓，面對雙重的打擊。

在缺乏物質及人力資源下，家庭社會資本成爲貧窮人士的惟一倚靠。不少貧窮人士就是靠家庭社會資本來維持生活。但家庭核心化、單親家庭的增加令家庭網絡弱化亦把貧窮人士最後所能倚靠的家庭社會資本削弱。

有較大接觸網的人，和網絡較小的人比起來，能獲取較多資訊，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比較高。可是人們喜歡跟自己相似的人發展關係，因爲社會條件相似的人有較多共同的利益，關係就比較持久。在人際網絡篩選與重組的過程中，人們持續投資情緒、情感，來強化彼此的信任基礎及交易的穩定性。他們和街坊、朋友的交易網絡被轉化爲教導、關心、分享的社會關係；上下線之間的利益聯繫被改造成相對封閉的和同質的“仿家庭衍生網絡”。

黃及李進一步指出，負面社會定型所產生的社會排斥正在阻礙被排斥者透過社交活動去建立異質不重複網絡，使他們失去創造社會資本的機會。被排斥的弱勢人士便容易處於上述同質化的“仿家庭衍生網絡”中。上述分析連繫了貧窮、社會排斥與社會資本的關係，但黃及李的分析是基於質性的個案研究，缺少全港的數據支持，本文正是以定量分析的方法搜集全港的數據，以補充有關研究的不足。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文的數據源自“制訂香港貧窮線：跨學科研究”（香港貧窮線研究）。該研究在1999年9月至2001年1月期間進行，按規劃統計小區的住戶入息中位數及住屋類型作爲分層單位，以隨機抽樣法在全港住戶中進行抽樣調查，成功訪問了3086個居住於低收入地區（地區的家庭入息中位數位於全港最低30%之規劃統計小區）之住戶。研究亦特別在抽樣中包括木屋區及平房區的住戶，該組人士包括絕大部分全港陸上的貧窮住戶。香港貧窮線研究的問卷調查以面對面方式進行，由住戶中自稱爲戶主的成年人進行作答。我們訪問居住在該單位中的所有住戶，包括板間房、套房等的住戶。有關受訪者的主要特徵，請參看表1。

研究目的

香港貧窮線研究之主要目的是瞭解這些家庭的開支模式及生活狀況，以制訂香港的貧窮線；而研究亦能分析貧窮戶的特色、消費模式、生活狀況及社會網絡的情況。在生活狀況及社會網絡的部分，我們嘗試量度受訪者遭“社會排斥”的程度及其“社會資本”，有半數(即1,502個)受訪者接受了這部分的訪問。本文便是利用這部分的數據集中比較貧窮人士與非貧窮人士，以及比較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的“社會資本”規模及性質。

本文選取了兩組邊緣社群：貧窮人士、無業及工作不穩定者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這是由於在理論上，文獻中的大部分研究均指出這兩組邊緣社群的社會資本較弱；而在實踐意義上，由於香港的貧窮及失業問題急速惡化，因此這兩組邊緣社群的狀況最需要關注。對於要如何解決香港的貧窮及失業問題，重新思考社會資本而並非單單從建設人力資本的角度考慮，亦有重要的社會政策意義。

變項的量度

貧窮

香港貧窮線研究採用入息替代(income proxy)的方法，利用“恩格爾曲線”(Engel curve)的轉折點(inflexion point)來定義貧窮線(Orshansky 1969; Bradshaw, Mitchell & Morgan, 1987; 黃洪及蔡海偉, 1996)。恩格爾曲線是指住戶食物開支佔住戶總開支的比例隨著住戶總開支的變化。有關的轉折點代表住戶對食物的邊際消費意慾(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的減慢。在轉折點之後，住戶不會繼續增加食物的數量，轉而購買較高素質的貨品或其它非必需品，以進一步改善生活素質。所以該轉折點表明，有關住戶的消費模式由以購買食物這必需品轉為可以選擇其他貨品，這便成為分開貧窮與非貧窮家庭的界線。

為了可以比較不同住戶結構及規模的住戶的開支模式，政府與學者發展出不同的換算表(equivalence scale)，以換算不同年齡家庭成員作為單身成人的比例。但對於應該如何制訂有關換算表，則一直有爭議(Fiegehen, Lansley & Smith, 1977)。雖然不同學者為家庭(Bradshaw, 1993a, 1993b)及兒童(Piachaud, 1979)訂立換算表，但由於有關換算表多是基於所在地區的住戶消費模式或以標準預算方法制訂，所以不適宜直接應用於其它地區。至於，香港亦缺乏學術研究制訂有關換算表；政府方面，香港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中，老人及兒童的基本金額比成人的基本金額還要高，所以有關換算表的計算是基於行政理由，而非科學的總結。由於上述原因，我們只能以簡單的方法，將所有家庭成員(不論年齡及排序)均作為一個單位成員處理，以人均的方法去統一不同規模家庭對其開支的影響，而放棄考慮其住戶結構的影響。這種處理法當然並不理想，但在沒有香港本土及認可性高的換算表的情況下，我們認為這比單單以住戶總開支來量度更為精確。

香港貧窮線研究以住戶人均開支替代住戶總開支作為x-軸，以住戶的食物開支佔總開支的百分比作為y-軸，來繪製香港的恩格爾曲線。由於曲線在位於住戶人均開支3,750元的位置出現轉折點，所以，我們便以住戶人均開支3,750元作為

香港的貧窮線，人均住戶開支每月少於3,750港元的住戶便介定為貧窮住戶，而所有貧窮住戶的成員便被介定為貧窮人士。

社會資本

不同學者對社會資本的概念化及操作有不同爭論 (林南, 2001; 李惠斌及楊雪冬, 2000)。由於香港貧窮線研究本身以訂立貧窮線為主要目的，所以未能包括較多數量的問題來量度受訪者的社會資本。為了解決資源的局限問題，我們嘗試以少量問題來勾劃出受訪者社會資本的輪廓，我們以簡單的量表來量度受訪者社會資本的大小，以便作比較。

量度社會資本的大小可以分為兩個步驟，首先我們須選取某些類別的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嵌入的載體，然後再量度這些類別社會網絡規模的大小。首先，在選取何種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量度上，我們參考了林南(2001)提出的方向：“社會資本是嵌入於社會網絡，有目的之行動中可以獲得或調用的一種資源”(林南, 2001: 3)。對於社會資本的大小，我們則參考 Flap (1999) 的意見：(1) 個人網絡中在需要時願意或有責任幫忙的人的數量；(2) 此等關係的力量；及(3) 可運用的資源。最後，我們則參考 Putnam (1995, 1996, 2000) 的意見，他認為社會資本具有社會組織 (如網絡、規範和信任) 的特徵，可促進相互利益的協調和合作。

香港人透過社會網絡可以直接獲得或調用的資源，主要是從有關親友的網絡中獲得經濟支援。我們以“可以借錢的親友數目”來量度受訪者經濟支援網絡的大小。除實質的經濟支援外，社會網絡另一重要的作用是資訊流通的管道。介紹工作可說是最重要的資訊之一，亦是建立網絡的主要功能。我們以“可以介紹工作的親友數目”來量度受訪者介紹工作訊息網絡的規模。最後，我們認為人際之間的“信任”是相互利益協調和合作的基礎。我們視“信任”為測量社會相互協調及合作的指標，並以“可信任的親友數目”來量度受訪者能相互信任網絡的規模。

我們以“經濟支援”、“資訊流通”與“相互信任”三個社會網絡人數，組成社會資本的總指數，有關指數的效度 (reliability) 頗高 ($\alpha = 0.756$)。我們進一步進行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以“可借錢的親友數目”與“可信任的親友數目”兩者的相關最高 ($r^2 = 0.78$)。由於親友會否提供經濟支援不單是涉及其經濟能力，更涉及親友間能否相互信任，所以兩者有頗強的相關性。而“可借錢的親友數目”與“可介紹工作的親友數目”的相關屬中度 ($r^2 = 0.40$)。由於經濟能力與介紹工作的能力通常成正比，但亦有部分親友可以借錢但卻未能介紹工作，反之亦然，所以兩變項只呈中度的正面相關。“可介紹工作的親友數目”與“可信任的親友數目”兩者的相關則較低 ($r^2 = 0.31$)，這顯示可信任的親友不一定可以介紹工作，尤其是對我們研究對象邊緣社群而言，尤為明顯。

除了社會資本的大小外，社會網絡是同質還是異質的，對社會資本的性質有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詢問受訪者在熟悉的親友中無業與在業的比例，以比較受訪者本身的工作狀況，來瞭解受訪者社會網絡同質化及異質化的情況。

研究結果

貧窮戶與非貧窮戶的劃分

樣本中有933戶(62.1%)的每月人均住戶開支少過3,750元,被界定為貧窮戶,其餘569戶(36.9%)被界定是非貧窮戶。受訪者的住戶每月總收入平均是15,804元,每月總支出是11,553元,而貧窮戶的每月總收入及總開支分別是12,327元及8,820元;非貧窮戶兩者分別是21,504元及15,983元,明顯較非貧窮戶高。貧窮戶的平均住戶人數是3.59人,大於非貧窮戶的2.82人。受訪者的平均年齡是49.6歲,有51.6%是女性。47.5%的受訪者只有小學及以下的教育程度。以下是樣本、貧窮戶及非貧窮戶的主要特徵(參看表1)。

表 1 樣本、貧窮戶與非貧窮戶的特徵

變項	樣本 (N=1,502)	貧窮住戶 (N=933)	非貧窮住戶 (N=569)	貧窮與非貧窮 差異顯著度
住戶特徵				
每月總收入(均值:元)	\$15,804	\$12,327	\$21,504	E ² =.12
每月總支出(均值:元)	\$11,533	\$8,820	\$15,983	E ² =.24
住戶人數	3.30	3.59	2.82	E ² =.06
戶主特徵				
性別(%)				λ =.01
男	48.4	46.8	51.0	
女	51.6	53.2	49.0	
年齡(均值)	49.6	52.6	44.7	E ² =.05
教育程度(%)				λ =.09
小學及以下	47.5	56.5	32.7	
中一至中三	23.6	23.5	23.7	
中四或以上	29.0	20.0	43.6	
戶主特徵				
婚姻狀況(%)				λ =.02
單身	14.4	10.9	20.6	
已婚	69.8	74.0	63.1	
離婚/分居	5.9	4.6	8.1	
喪偶	9.7	10.5	8.3	
是否在港出生(%)				λ =.07
是	35.6	25.6	51.8	
否	64.4	74.4	48.2	
每月入息(均值)	\$5,997	\$4,176	\$8,975	E ² =.12

參看表2，受訪者的貧窮狀況與其工作狀況顯著相關 ($\chi^2=149.27$, d.f.=2, $p<0.01$, Lamda=0.14)，但並不是所有沒有工作的人士均屬於貧窮，有75.2%沒有工作的人士屬貧窮人士，但仍有24.8%並不屬於貧窮人士，而在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組中，亦有高達40%並不屬於貧窮人士。貧窮是受訪者現時的生活狀況，但這受其過去的收入及資產的情況所影響，如部分中等收入的失業者，雖然面對失業的情況，但由於有一定的儲蓄及資產，所以其生活並不一定貧窮；另一方面，一些有固定工作的低收入人士如非技術勞工，其工作穩定但仍然生活貧窮。貧窮狀況與工作狀況是相關但並不不同的變項，貧窮者與無業及職業不穩定者屬不同的邊緣社群，其社會資本的狀況有相同亦有不同的地方，有需要作出不同的分析。

表2 貧窮狀況與工作狀況的分佈

	沒有工作	散工、不固定工作	固定工作	總計
貧窮	615	108	210	933
(列百分比)	75.2%	60.0%	41.7%	62.1%
非貧窮	203	72	294	569
(列百分比)	24.8%	40.0%	58.3%	37.9%
總計	818	180	504	1502
	100.0%	100.0%	100.0%	100.0%

參看表3，沒有工作者的每月住戶總收入及住戶總開支分別是12,675元及9,651元；而散工、不固定工作兩者分別是13,672元及11,041元，而固定工作者的則是21,643元及14,764元。由此可見，和固定工作者相比，沒有工作者及散工、不固定工作者不單處於勞動力市場的邊緣，其生活亦處於較困難的狀況，屬重要的邊緣社群。

表3 不同工作狀況受訪者的住戶收入與支出

變項	樣本 (N=1,502)	沒有工作	散工、不固定工作	固定工作	差異顯著度
住戶特徵					
每月總收入 (均值: 元)	\$15,804	\$12,675	\$13,672	\$21,643	$E^2=.10$
每月總支出 (均值: 元)	\$11,533	\$9,651	\$11,041	\$14,764	$E^2=.11$

社會網絡的規模

貧窮人士與非貧窮人士的比較

據我們瞭解，當受訪者的家庭有財務困難時，有近四成半 (43.9%) 的受訪者連

一個可以借錢的親友也沒有，有三成 (30.5%) 表示只有一至兩個可以借錢 (參看表4)。當受訪者的家庭有人要尋找工作時，有近六成 (58.1%) 的受訪者連一個可以介紹工作的親友也沒有，有約兩成 (19.2%) 表示只有一至兩個親友可以介紹工作。至於受訪者的家庭有多少個可以信得過的親朋戚友，有四分之一 (26.1%) 的受訪者表示連一個可以信得過的親友也沒有，有約三成 (29.4%) 表示只有一至兩個可信得過的親友。

比較這三類不同社會網絡的大小，我們瞭解到受訪者平均有3.34個可信得過的親友，這明顯地比平均有2.01個可以借錢親友的數目多；而受訪者平均只有1.74個可以介紹工作的親友，是三類社會網絡中規模最小的。

表4 不同性質社會網絡的規模

	0	1	2	3	4	5個及以上	平均數	N	標準差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借錢給你?	43.9%	13.6%	16.9%	13.2%	4.1%	8.3%	2.01	1502	6.866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介紹工作給你?	58.1%	6.9%	12.3%	10.1%	2.8%	9.8%	1.74	1501	4.534
你有多少個可以信任的親友?	26.1%	11.8%	17.6%	17.9%	5.5%	21.0%	3.34	1502	7.545

我們進一步比較貧窮人士 (家庭人均支出少於每月3,750元的人士) 與非貧窮人士社會網絡的情況，發覺貧窮人士的社會網絡的規模明顯比非貧窮人士小 (參看表5)。

表5 貧窮人士與非貧窮人士社會網絡規模的比較

	貧窮人士 平均數 (標準差)	非貧窮人士 平均數 (標準差)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借錢給你?	1.68 (7.66)	2.55 (5.27)	F=5.681 d.f.=1 p<0.05 Eta=0.061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介紹工作給你?	1.36 (3.15)	2.36 (6.12)	F=17.338 d.f.=1 p<0.01 Eta=0.107
你有多少個可以信任的親友?	2.97 (8.8)	3.96 (4.78)	F=6.207 d.f.=1 p<0.05 Eta=0.064
社會資本指數總計	6.01 (17.0)	8.88 (13.62)	F=11.634, d.f. =1, p<0.01 Eta=0.088
(N)	(933)	(569)	

貧窮人士中可借錢親友的平均數目是1.68人，少於非貧窮人士的2.55人 ($F=5.681, p<0.05$)。貧窮人士中可介紹工作親友的平均數目是1.36人，亦少於非貧窮人士的2.36人 ($F=17.338, p<0.01$)。貧窮人士中可信任親友的平均數是2.97人，少於非貧窮人士的3.96人 ($F=6.207, p<0.01$)。貧窮與非貧窮人士三類網絡的差別均顯著，而以可以介紹工作親友數目差別與是否貧窮的相關最大 ($\text{Eta}=0.107$)。以三組社會網絡組成的社會資本指數計，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指數是6.01，明顯比非貧窮人士的8.88 為低 ($F=11.634, d.f. =1, p<0.01$)。

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較低經已是衆多研究的共識 (Saegert, Thompson, & Warren, 2001)，如何才能增加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亦成爲大家思考如何協助貧窮人士脫貧的關鍵。我們可考察貧窮人士中社會資本較高一群的特性，以便思考如何作能力建設 (capacity building)。

在1,502名受訪者中，有933人屬貧窮人士，而其中207人的社會資本超過樣本的平均值 (7.1)，其社會資本屬較強的類別。在這群貧窮但社會資本較強的受訪者中，其特性大致與樣本中貧窮者相同。但下列三項特徵卻有明顯分別：首先，社會資本較強的人士年齡較低，其平均年齡是45.7歲，較貧窮人士平均年齡52.6歲低近7年；其次，這類人的住戶人數較多，其平均人數是4.0人，較貧窮人士的3.59人爲大；最後，這類人士若屬失業者，其失業的時間較短，在被訪前的兩年期間，失業的總月數是15.5月，但貧窮人士失業者整體的失業平均月數是19.7月。總結而言，年輕、家庭成員較多及與勞動力市場有更經常接觸的貧窮人士，其社會資本較強。

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的比較

表6 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的社會網絡規模

	沒有工作 (組別0)	散工及不固 定工作 (組別1)	固定工作 (組別2)	ANOVA/ Posthoc (LSD)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 借錢給你?	1.71 (8.11)	1.71 (2.73)	2.61 (5.54)	$F=2.911$ d.f.=2 $p>0.05$ 0/1 n.s 0/2 $p<0.05$ 1/2 n.s.
有多少個親友可以 介紹工作給你?	1.13 (2.57)	2.56 (4.50)	2.45 (6.49)	$F=16.866$ d.f.=2 $p<0.01$ 0/1 $p<0.01$ 0/2 $p<0.01$ 1/2 n.s.

表6 (接上表)

	沒有工作 (組別0)	散工及不固 定工作 (組別1)	固定工作 (組別2)	ANOVA/ Posthoc (LSD)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你有多少個可以信 任的親友?	2.82 (8.37)	2.98 (3.53)	4.33 (7.07)	F=6.603 d.f.=2 p<0.01 0/1 n.s. 0/2 p<0.01 1/2 p<0.05
社會資本指數總計	5.65 (17.43)	7.21 (8.13)	9.42 (15.80)	F=8.864, d.f. =2, p<0.01
(N)	818	179	505	1502

我們比較不同工作狀況人士的社會網絡規模，發覺沒有工作及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的規模明顯少於有固定工作的人士(參看表6)。沒有工作及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可借錢親友的平均數目同是1.71人，少於固定工作人士的2.61人，經 LSD posthoc 分析組際差異後，發現沒有工作與固定工作的差別顯著 ($p<0.05$)，但其他組合的差別則不顯著。這顯示固定工作比沒有工作的人士有更大的經濟支援網絡。

在介紹工作的網絡方面，以沒有工作人士所有的規模最小，平均只有1.13人，這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2.56人及有固定工作人士的2.45人相比，差別顯著 ($F=16.854, p<0.01$)。經 LSD posthoc 分析組際差異後，發現沒有工作者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者，以及沒有工作及有固定工作者的差別均顯著 ($p<0.05$)，而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與有固定工作人士的差別則不顯著。這顯示沒有工作人士的尋找工作網絡明顯比有工作(包括固定工作或不固定工作)人士的規模小。

有固定工作人士可信任的親友網絡的規模最大(4.33人)，明顯地勝於沒有工作者(2.82人)及散工、不固定工作人士(2.98人) ($F=6.603, p<0.01$)。經 LSD posthoc 分析組際差異後，發現有工作人士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者，以及有工作及固定工作者的差別均顯著 ($p<0.01$)，而沒有工作者與散工及不固定工作者的差別則不顯著。這顯示有固定工作人士的可信任網絡的規模明顯比沒有固定工作者(包括沒有工作及不固定工作)的規模大。以三組社會網絡組成的社會資本指數計，沒有工作的社會資本指數是5.65，明顯較散工及不固定工作者的7.21及固定工作者的9.42為低。

社會網絡的同質化

貧窮人士與非貧窮人士的比較

表7 貧窮戶與非貧窮戶在熟悉親友中無業者與在業者的比重(%)

在熟悉的親友中	貧窮住戶	非貧窮住戶	整體
無業的比在業的多很多	11.8	6.2	9.7
無業比在業多	19.8	9.2	15.8
無業及在業的差不多	23.4	21.5	22.7
在業的比無業多	29.9	34.4	31.6
在業的比無業多很多	15.1	28.7	20.2
總計	100.0	100.0	100.0
(N)	(930)	(567)	(1497)

$$(\chi^2=72.3, d.f.=4, p<0.01, \text{Tau}=0.048)$$

我們詢問受訪者，在他們熟悉的親友中，是以無業者(即失業及沒有工作)還是在業者(有工作)佔多數(參看表7)? 我們發現有較大比例的貧窮人士，在其熟悉的親友中出現無業者比在業者多的情況。有合共31.6%的貧窮戶表示，在熟悉的親友中無業比在業“多很多”及“多”；非貧窮戶方面，兩者合共15.4%，只及貧窮戶的一半。這顯示貧窮人士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貧窮”與“同質化”，有顯著但微弱的相關。

不同性別工作狀況人士的比較

不單是受訪者的貧窮狀況，他們的工作狀況亦與其社會網絡的同質化有明顯的關係。我們發現受訪者如果無業或做散工或無固定工作，那在其熟悉的親友中，無業者的比例比固定工作人士的高。有33.7%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表示，在熟悉的親友中，無業的比在業的“多很多”及“多”。至於沒有工作人士，兩者的合共是31.1%。在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網絡中，其熟悉的親友主要是無業人士，其次是沒有工作人士，這與一般的估計有差別。我們曾經控制年齡、教育水平及是否在港出生等三項因素，但仍出現散工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同質化較沒有工作人士嚴重的情況。不過，在控制性別因素時，有關情況並未出現，所以我們確認出現上述情況是由於受到性別因素對工作類別及網絡同質所影響。

表8 不同性別受訪者的工作情況與在熟悉親友中無業者與在業者的比重(%)

	沒有工作	散工、不固定 工作	固定工作
男性			
無業的比在業的多很多	17.8	13.7	2.8
無業比在業多	21.5	21.4	8.7
無業及在業的差不多	22.1	29.1	19.2
在業的比無業多	25.5	27.4	41.6
在業的比無業多很多	13.1	8.5	27.6
	($\chi^2=89.5$, d.f.=8, $p<0.01$, $G=0.382$)		
(N)	(321)	(117)	(286)
女性			
無業的比在業的多很多	9.5	8.2	5.5
無業比在業多	16.2	23.0	10.6
無業及在業的差不多	24.1	32.8	18.8
在業的比無業多	31.4	24.6	32.1
在業的比無業多很多	18.8	11.5	33.0
	($\chi^2=31.3$, d.f.=8, $p<0.01$, $G=0.191$)		
(N)	(494)	(61)	(218)

我們控制性別因素，再比較不同工作狀況的工友網絡的情況，發現男女有很大的差異(參考表8)。在773名女性受訪者中，有494人(佔女性63.9%)沒有工作。這顯示有較多女性受訪者屬沒有工作的類別，而只有61人(7.9%)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類別。男性方面，在724名男受訪者中有321人(44.3%)沒有工作，有117人(16.2%)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類別。

有四成(39.3%)沒有工作的男性表示，在熟悉的親友中，無業比在業者“多”及“多很多”，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男性的比例則有35.1%。所以沒有工作的男性較工作不穩定的男性，社會網絡同質化的情況仍較為嚴重。

我們亦發現男性比女性的受訪者更容易出現本身職業不穩定而被孤立的現象。沒有工作的男性，其熟悉的親友“無業比在業的多很多”，及“無業比在業多”兩者合共高達39.3%；而沒有工作的女性，這兩者合共只有25.7%，性別的差異非常明顯，男性無業時社交網絡同質化的傾向明顯較女性為大。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男性，上述兩者合共35.1%；而屬散工及不固定工作女性，兩者合共31.2%，仍可見工作零散化對男性社交網絡的同質化影響亦較女性為高。

反觀屬有固定工作的男性，在業比無業的“多很多”及“多”兩者合共69.2%；而屬有固定工作的女性，兩者合共65.1%。有固定工作的男女，其社會網絡中以在業人士為主的情況差不多。但沒有工作的男性，其社會網絡的明顯較女性更容易出現孤立的情況(男： $G=0.382$ ；女： $G=0.191$)。

討論

不同社會網絡的規模

我們以受訪者的三類社會網絡的規模——可借錢、可介紹工作及可信任親友的數目——來反映其社會資本的大小。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仍有一定數量可信任的親友(平均3.34人)。但受訪者在有經濟需要時，能借錢的親友提供經濟援助的網絡只有2.01人，只及信得過親友網絡的三分之二。此外，介紹工作的親友規模更是三種社會網絡中規模最小的，只有1.74人。由此可見，透過親友找到工作比透過親友借錢還要來得困難，這反映親友網絡介紹工作的功能比經濟支援的功能還要低。

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較弱

研究顯示，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指數是6.01點，比非貧窮人士的8.88點明顯為低。貧窮人士的三類社會網絡的規模明顯小於非貧窮人士，其中以介紹工作的網絡的差別與是否貧窮的相關最顯著。貧窮人士的經濟支援網絡較非貧窮人士小，原因何在？我們估計，一方面是由於長貧難顧，親友只能提供短期的經濟援助，而未能長期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亦由於貧窮人士的親友很多時候本身亦面對經濟困難而自顧不暇。所以，貧窮人士在經濟出現困難時，可以借錢予以協助的親友數目不多。這顯示貧窮人士的家庭及親友作為經濟支援及危機緩衝的功能比非貧窮人士為低。相對於非貧窮人士，貧窮人士有需要透過家庭以外的制度(例如社會保障制度)才能應付經濟可能出現的危機。

貧窮人士的可介紹工作社會網絡的規模亦較非貧窮人士為少。貧窮人士主要依靠親友網絡的非正規途徑來尋找工作，而並非依靠勞工處、報章等正規途徑來尋找工作(黃洪及蔡海偉, 1998)。由於香港貧窮人士可介紹工作的親友網絡相對非貧窮人士來說較少，亦即表示貧窮人士透過親友網絡來尋找工作機會較非貧窮人士為低，這減低了貧窮人士透過工作而脫貧的機會。

在貧窮人士的可信任親友中，其社會網絡的規模亦較非貧窮人士的小。要維持親友間信任的關係，須有經常的社交接觸及對等的互動，但由於經濟的匱乏限制了貧窮戶社交網絡的發展，所以其可信任親友的網絡亦比非貧窮戶的規模小。

但並不是所有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均弱，貧窮與社會資本有不同的向度。根據研究的結果，我們知道貧窮人士中，年齡較低、家庭人數較多以及失業的時間較短的人士，其社會資本會較高。這一方面說明，家庭仍是貧窮人士集中社會資本的主要機構，所以家庭人數較多的住戶，可透過家人擁有更大和更多元的社會網絡，其社會資本亦較強；另一方面，我們亦了解到貧窮人士在工作場所建立的工友網絡以及社會聯繫亦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在日後的研究中，我們可深入瞭解貧窮人士的家庭狀況和就業狀況與社會資本的相互關係，以便能找出方法增加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

貧窮人士社會網絡的同質化

我們發現有三成貧窮人士的社會網絡中出現無業者比在業者多的情況。無業是貧窮及低收入的主要原因，這顯示有相當部分的貧窮人士的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的情況。無業的親友本身亦面對失業及生活的壓力，所以有較少機會提供經濟支援以及尋找工作的信息與途徑，因此同質化的社會網絡對貧窮人士所能提供的支援較少，亦顯示其社會資本的貧乏。

無業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資本較少

我們研究的結果發現無業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資本較少，沒有工作的社會資本指數是5.65點，明顯較散工及不固定工作的7.21點及固定工作的9.42點為低。沒有工作的社會資本指數更較貧窮人士的6.01點低，而散工及不固定工作者的社會資本指數又反較貧窮人士的為高。這顯示與勞動力市場的接觸對增加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有重要的影響，值得我們關注。以下我們來分析與勞動力市場不同程度的接觸對不同社會網絡所造成的影響。

沒有工作人士的經濟支援網絡的規模明顯小於有固定工作的人士，而其尋找工作的社會網絡亦小於有工作人士的（包括散工及固定工作人士）。固定工作人士的可信任親友網絡的規模則明顯較沒有工作及散工的人士為大。

沒有工作的人士完全脫離勞動力市場，所以認識仍在勞動力市場工作的工友數量較仍有工作人士為少，而工友網絡是大多數低技術勞工尋找工作的主要途徑，所以沒有工作人士可介紹工作的社會網絡的規模明顯較有工作人士小。由此可見維持個人的工作對保持本身成為互相介紹工作社交網絡的一部分至為重要。介紹工作是維持工友網絡之間最重要的社會資本功能，但隨著失業率的高企，工友網絡未能透過介紹工作來繼續維繫，失業人士的社會資本明顯下降而變得貧乏。

信任是建構社會資本中的重要原素，而散工、不固定工作人士可信任親友的規模明顯較有固定工作者為小。這可能是由於散工及固定工作人士的工作經常要轉換，所以較難與工友建立持久的關係，因此工友網絡中可信任的工友數目較有固定工作的人士少。隨著靈活管理的興起，工作愈來愈零散化，兼職、合約與外判工作愈來愈多，不少原先屬固定工作的人士要轉為散工及不固定工作。如此一來，他們的可靠親友的數目很可能會減少，這顯示不穩定的工作會導致邊緣勞工(包括失業及不穩定工作)社會資本的貧乏。

無業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社會網絡的同質化

分別各有三成多的無業人士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中出現無業者比在業者多的情況，顯示有相當部分無業及不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的情況。可見固定的工作提供重要的機會，讓有關人士與在業人士經常保持接觸，而散工及不固定的工作卻未能提供與固定工作同樣程度的接觸，使有關工友的網絡不能維持。

社會網絡同質化與受訪者工作狀況兩者有顯著及頗強的相關，而且互相影響。一方面是由於無工作或不固定工作人士較少有機會或途徑去接觸在業人士，所以他們熟悉的親友中亦以無業者居多，亦即是說職業狀況的不穩定造成了社會網絡的同質化。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社會網絡中在業的親友較少，令他們較難獲得就業的信息，也較難通過親友作介紹，所以亦使他們缺乏再次進入穩定的勞動力市場的途徑，亦即是說社會網絡同質化反過來又影響失業的持續或造成就業的不穩定。社會資本的貧乏與不穩定的就業形成一個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

我們發現香港出現類近 Paugam (1999) 所描述的，在法國出現的情況：失業或不穩定工作對男性造成社會網絡同質化的影響明顯比女性更大。我們估計原因之一是男性更為依靠工友網絡作為主要的其社交圈子，而女性的社交圈子較多元化，親友及鄰舍網絡可補充工友網絡的不足，所以失業及就業不穩定對男性的社交網絡同質化的影響較女性大。

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在抽樣及對社會資本的量度方面均有明顯的局限。首先，由於研究的抽樣集中在香港的貧窮區域，所以我們的樣本僅可代表香港低下層市民的狀況，而並不代表全港市民。此外，香港對社會資本的概念亦沒有經過信度及效度測試的本地量表，加上我們的研究是以制訂香港的貧窮線為主要目標，因此，由於資源的限制，我們只能以有限的問題來量度受訪者的社會網絡，從而反映受訪者的社會資本狀況。此外，由於這研究是一橫切面式 (cross-sectional study) 的研究，只就 1999 年至 2001 年香港社會資本的狀況作出初步的描述，而並非追蹤式研究 (longitudinal study)，所以未能細緻分析貧窮、社會資本以及就業狀況間的因果關係及變化趨勢。這些問題均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探討。

結語

世界銀行近年修改其多年只著重以經濟發展來解決貧窮問題的政策，認為脫貧的政策並不能單靠對貧窮人士的經濟援助，反而是要協助貧窮人士及社區建造社會資本，才能根治貧窮問題，而不少研究及實踐亦推動以建造社會資本來對抗貧窮 (Saegert, Thompson and Warren, 200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開始重視建造社會資本，行政長官董建華特別撥出三億元成立“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建立社會資本為目標。然而，有關基金並沒有特別針對香港的貧窮人士及弱勢社群，亦並非以解決貧窮問題為首要目標，可見政府仍未視建造社會資本是直接解決香港嚴重的貧窮問題的策略，而只是視之為加強市民凝聚力的手法。忽視以建造社會資本作為解決貧窮問題的主要策略，很可能是由於香港對社會資本的本土研究及討論仍處於起步的階段，無論是政府、公民社會以及學術界，他們對於社會資本的理念、量度及如何建造仍不清

晰。本文嘗試根據香港本土的情況，以定量的方法量度香港社會資本的存量，並探討貧窮人士社會資本貧乏，正是指出貧窮問題與社會資本問題的直接相關，本文雖然有很大的局限及不足之處，但仍希望可成為進一步討論及研究的起點之一。

本文指出貧窮人士比非貧窮人士的社會資本低，而失業及工作不穩定的人士也比固定工作人士的社會資本較低，其社會網絡亦較同質化，這對男性的影響尤為嚴重。而社會資本較低及較同質的處境正是貧窮人士失業及貧窮問題持續的關鍵原因。本文嘗試指出貧窮人士所面對的不單是經濟匱乏問題，而是社會資本貧乏所造成的影響，所以對抗貧窮的政策應針對貧窮人士社會資本的貧乏。

在選擇以什麼社會政策來解決貧窮問題時，單以社會保障政策如綜援及高齡津貼等現金援助的方法只能解決貧窮人士經濟匱乏的問題，但社會保障政策較被動式的福利保障並未能解決貧窮人士社會資本不足的問題，而且由於社會出現對接受綜援人士的負面標籤如“綜援養懶人”，社會保障的受助人很可能面對主流社會的排斥，進一步迫使受助人處於社會孤立的狀況，減少其本來經已很不足的社會資本，而令其真正脫貧的機會降低。

筆者認為社會保障政策對於防止貧窮問題惡化非常重要，但對於解決及根治貧窮問題則未夠積極。本文指出，貧窮人士社會資本的貧乏與貧窮狀況的持續互為影響，構成惡性循環。如何避免貧窮、失業及就業不穩定勞工的社會資本進一步消失，甚至重新發展及建設這些貧乏人士的社會資本，改善其“社會資本的貧乏”，成為協助這些人士突破貧窮困局的重要策略，亦是更積極主動脫貧政策的方向。

社會工作過去一直透過小組及社區工作去拓展案主的自助及互助網絡，近年更重視以網絡工作手法去連結不同類別的案主及小組，亦重視如何建立及發展正規及非正規支援網絡，來達到“社區照顧”的目標，所以社會工作者擁有對於如何建造及增加案主的社會資本有豐富的理論和實踐。如何擴大貧乏人士的社會網絡、加強人際關係的信任，連結不同性質的網絡，社會工作者實應整理及發展本身的經驗，以便在建造社會資本以解決貧窮問題上，作出社會工作專業應有的貢獻。筆者相信建造社會資本將是香港社會工作研究及實踐的一重要課題。

社會工作具體建造社會資本來解決貧窮問題的介入可參考“社區經濟發展”(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的手法，“社區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增加貧窮社區中的社會資本以消滅貧窮(Sherraden & Nimacs, 1998; Midgley and Livermore; 1998; Gittell and Thompson, 2001)。社區經濟的建立是為地域上的貧窮及為被社會排斥的人士建立一個能互相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網絡。社區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重建或建立社區或社群中的社會資本，其中主要的方法是搞活地域上不重複網絡群的結連，將在該地域工作或居住的貧窮人士串連起來。社區經濟若能夠建立，嵌入其中的社會資本便能不斷累積，而且社區經濟所產生的“區域地緣關係”也能創造一種團結互助的社會規範，去制約純利己的經濟行為。

英文參考資料

- Bebbington, A. (1999). Capitals and capabilitie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easant viability, rural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World Development*, 27(12), 2021–2044.
- Bradshaw, J., Mitchell, D. & Morgan, J. (1987). Evaluating adequacy: The Potential of budget standard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2), 165–181.
- Bradshaw, J. (ed.) (1993a). *Budget Standards for the United Kingdom*. Aldershot: Avebury.
- Bradshaw, J. (ed.) (1993b). *Household Budgets and Living Standards*. London: J R Foundation.
- Coleman, J.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Fiegehen, G.C., Lansley, P.S. & Smith, A.D. (1977).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Britain 195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iedman, J.J. (2001). The role of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stimulating social capital and rebuilding inner city economies: A practition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o Economics*, 30(2), 139–143.
- Fukuyama, F.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The coming agenda. *SAIS Review*, 22(1), 23–37.
- Gittell, R. & Thompson, J.P. (2001). Making social capital work: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 Saegert, J.P. Thompson and M.R. Warren (eds.),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ranovetter, M. (1981). Toward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income differences. In I. Berg (e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Labor Market*, pp. 11–47, Academic Press.
- MacPherson, S. & Lo, O.Y. (1997). *A Measure of Poverty*. Hong Kong: Dep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idgley, J. & Livermore,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M.S. Sherraden and W.A. Nimacs (eds.),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pp. 20–40, Binghamton, NY: The Haworth Press.
- Mitlin, D. (2001). Civil society and urban poverty-examining complexity.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3(2), 151–173.
- Orshansky, M. (1969). How poverty is measured. *Monthly Labor Review*, 92, 37–42.
- Ostendorf, W., Musterd, S. & De-Vos, S. (2001). Social mix and the neighbourhood effect. Policy ambi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Housing Studies*, 16(3), 371–380.
- Paugam, S. (1999). Weakening and breaking of social ties: analysis of explanatory factors. In D. Avramov (ed.), *Coping with Homelessness: Issues to be Tackled and Best Practices in Europe*, pp. 29–51, Aldershot: Ashgate.
- Piachaud, D. (1979). *The Cost of a Child*. London: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 1–24.
- Portes, A. & Landolt, P. (1996).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Prospect*, 7(26) (May–June), 18–21, 94.

- Portes, A. & Landolt, P. (2000). Social capital: Promise and pitfalls of its role i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32(2), 529–547.
- Putnam, R.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Putnam, R.D. (1996).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The American Prospect*, 24, 34–48.
- Putnam, R.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nkin, B.H. & Quane, J.M. (2000). Neighborhood poverty and the social isolation of inner-city African American families. *Social Forces*, 79(1), 139–164.
- Saegert, S., Thompson, J.P. & Warren, M.R. (eds.) (2001).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herraden, M.S. & Nimacs, W.A. (eds.).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Binghamton, NY: The Haworth Press.
- Stevenson, W.B. & Greenberg, D. (2000). Agency and social networks: Strategies of action in a social structure of position, opposition, and opportun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5, 651–678.
- Wilson, W.J.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中文參考資料

- 李惠斌及楊雪冬 (編) (2000)。《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南 (2001)。社會資本：爭鳴的範式和實證的檢驗。《香港社會學學報》，(2)，1–38。
- 政府統計處 (2001)。《2001年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 莫泰基及梁成安 (1997)。《香港貧窮率》。香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 黃洪及李劍明 (2001)。《困局、排斥與出路：香港“邊緣勞工”質性研究》。香港：樂施會。
- 黃洪及蔡海偉 (1996)。《香港低開支住戶開支模式研究》。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樂施會。
- 黃洪及蔡海偉 (1998)。《終止及重新領取綜援研究》。香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樂施會。